

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

东洋文论



吴俊 编译



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

东洋文论

吴俊 编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1998-60号

责任编辑:蒋 恒
封面设计:王义钢
责任校对:鞠 朗

东 洋 文 论
——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
吴 俊 编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49.7万
插 页 5
印 数 1—2000
版 次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1627-X/G·428
定 价 37.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译前言

我在日本呆了几乎两年的结果之一，就是这本书。书中所收录的都是近十年来日本学者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并且基本上是首次译成汉语在中国发表、出版。

出版这样一本书，在我是有多重原因的。据我并不完全的了解，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在中国出版这样的著作，就显得十分困难了。倒并不是国内学者或出版界不了解这种著作的学术价值，最大的障碍似乎还是经济问题。其次便是翻译问题。因此，除了散见在刊物上的不多的单篇论文和更少的个人著作外，能够显示我们的东方邻国研究中国文学的综合性著作，竟是难觅踪影。这使得我们对海外汉学的视野不免多少显得有些狭窄了。我们不太清楚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而首先则是我们无从（或竟无力）了解别人。中国是个大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本不该如此小家子气的。鲁迅说，不管什么，先拿来再说。很早以前，日本便从中国拿去很多东西；后来，他们又从欧美拿去了许多东西，并且，现在还在拿。这样的“拿来主义”，对于日本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其在近代的几度崛起，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我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文化”，也可以说是精神和观念意识。那么，只要不犯自闭症，我们也尽可到处去拿来的，而且在事实上，中国文学早已不再囿于中国了，它具备了世界文学的品质。赋予中国文学以世界文学品质的，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世界各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所持的“拿来主义”态度。现在的这本书，它所展示的就是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文学品质的一个侧面——东洋（日本）人眼中的现代中国文学。但我首先还得感谢这些东洋人——他们都是我的异国师友，没有他们的拿

去,也就没有我这次的拿来。我拿来的是东洋(日本)的中国文学。

说到世界文学和东洋这类概念,拿我们中国和日本的使用来比,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所说的东洋,确指日本无疑;而日本人语汇中的东洋,则是泛指亚洲大陆,或狭义地指东南亚,极少数特指场合是指中国地域,日本自身是并不包括在内的。这样,在东洋一词的所指地域和方向上,中国与日本恰好相反。我以为在这同一语词使用上的有趣现象,反映的则是深刻的“世界”观意味——中国文化是如何看待“世界”(包括自身)的,而日本又是如何?其中有一些很不轻松的问题。对此,我已有另文论及,这里不再重复。但意识到这种区别以后,这本书的书名也就决定了。所谓东洋文论,在日本人看来是中国文学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却是日本(人的)文学论。在我看来,把日本的中国文学论视为日本(的)文学论,也无不可。正是在东洋一词的这种使用中,我体会到了歧义所含有的世界(文学)意味。这也可以说是汉字文化的魅力之一吧。

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交流,依赖于对语言意义的充分贴近的理解。虽然所谓合理的误读曾时髦一时,几成口头禅。但误读毕竟是误了,为误而辩,无论如何堂皇,总不能变“误”为“正”吧。这个问题在中国译介外籍时存在,而在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许多事例中也并不少见。可能只是我的一种偏见,相对而言,我觉得日本学者对中国问题的了解,要比欧美学者更为合情合理。汉语和西洋文字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太,由语言所表示和反映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乃至整个世界观,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这既说明它们之间的交流是必需的,同时也可说是困难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可谓得天独厚。汉语和日语的亲缘性,保证了它们在文化上的亲缘性。对此我坚信不疑,尽管现今的日本还算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不仅如此,关键还在于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及其学术内涵。一般所说的日本学者的实证方法,其实并不限于罗列资料、考证事实,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实证方法所依托的历史意识和逻辑思维。实

证只是表象和手段,以实证逼近历史(甚至企图还原历史)并由此把握历史现象之中的逻辑关系(包括对偶然、变量因素的考察),达到目前所能达到的对于历史(对象)的充分了解。这才是目的,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目的。我把日本学者的研究理解为是一种“实证—历史—逻辑”的系统过程。说到这里,我的偏见又来了:欧美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往往在一些基础层面上陷于“误读”而不自觉,但他们的“合理”阐释倒是洋洋可观,只是距离中国的实际情境过于遥远。在我看来,可博一观,不必深责其隔靴搔痒;把它们视为欧美文化的“中国观”,也就心平气和了。况且东西方的沟通也非一蹴而就,关注对方是对话的前提。

以上算是我编译这本书的一些最基本、也是最能够简单陈述出来的理由。别的我不敢妄测,但通过这本译著,读者能够获得日本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一种现状态势或全貌概观,那还是可以自信的。其他的有关话题就放在别的场合去讲了。

吴俊

1997年1月18日

目 录

编译前言 (1)

丸山 昇 (1)

- 丸山 昇 战后 50 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 (3)

阿部兼也 (33)

- 阿部兼也 鲁迅仙台时代思想的探索
——关于“退化”意识的问题 (35)

- 伊藤虎丸 鲁迅思想的独特性与基督教
——围绕着接受近代文化 (48)

- 片山智行 何谓鲁迅文学 (71)

- 丸尾常喜 谈鲁迅的文学(讲演两篇) (85)

- 大谷通顺 鲁迅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从中所表现的牢狱脱出形象 (115)

- 中里见 敬 《伤逝》的独白和自由间接引语
——从叙述学和风格学角度作一探讨 (133)

- 谷 行博 《肥皂》是怎样作成的 (155)

藤井省三 (171)

- 藤井省三 恋爱中的胡适
——留学美国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173)

- 清水 贤一郎 革命与恋爱的乌托邦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工读互助团 (200)

三、左翼文学 (223)

- 小谷一郎 东京左联成立前史(其一) (225)
芦田 肇 冯雪峰“同路人”理论的接受与形成
——《革命与知识阶级》管见 (287)
近藤龙哉 《文艺讲话》在重庆的传播与胡风
——大后方的民主之战与毛泽东思想 (326)

四、诗人与诗 (347)

- 松浦恒雄 回旋的诗情
——试论林徽因的诗 (349)
佐藤普美子 相对者双方的时空
——谈冯至的交流观 (373)
是永 骏 试论中国当代诗 (385)

五、文学理论 (399)

- 青野繁治 “流派研究”中的“海派” (401)
宇野木 洋 异文化接受的两种形态:“转向”与“回心”
——当代中国对“西方”理论接受的一个侧面
(413)
阪口直树 《腐蚀》的背景
——茅盾与国民党“特务组织” (434)
松冈纯子 许地山的《命命鸟》与夫人林月森之死
——从佛典的角度来分析 (464)

六、文学批评 (485)

- 江上幸子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十年 (487)
白水纪子 《妇女杂志》所展开的新性道德论
——以爱伦凯为中心 (507)

樱庭弓子 苏青导论 (529)

 (571)

佐治俊彦 上海・孤岛・越剧 (573)

编译后记 (587)

总 论

战后 50 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

丸山 昇

内容提要 本文是作者在 1995 年 10 月 6 日的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集会”(通称“前夜祭”)上的报告记录稿。主要回顾和总结战后 50 年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大致发展过程、历史面貌以及各阶段的基本特点。作者是这一全部历史的“当事人”,从而得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简明又不失扼要地从容描述与评价这一段研究历史,并对现状和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期待。

除了文学以外,作者还涉及到了这一历史时期中日本和中国的一些政治、社会状况,提出了一些相当发人深省的问题和观点。

一、战后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

刚才,我被介绍为是战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事人,但不管怎么说,我这个所谓的当事人还是很可怜的——1948 年我才开始学习中文,因而战后初期的事根本不知道。坦率地说,在我开始学中文时,连鲁迅的名字也不知道。所以,对下面将要回顾的事,以及在当时或多或少、模模糊糊知晓一些的事情,我想还是凭记忆边想边谈吧。

我手头有一份参考资料——《战败后(1945~1949)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略年表》^{〔1〕}，其中选取的只是与今天的话题有关的部分。如大家所知，战前发行的《中国文学》杂志在战时停刊了，战后重又复刊。并且我曾记得，在这以后，竹内好回到日本，在他看来复刊后的杂志状态很不像话，为此，他曾抛出了一份措词激烈的备忘录。因为这一冲击，杂志又停刊了。但这次我调查后发现，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时间上有点不相合的地方，杂志的终刊号上也登载了竹内的文章。总之，从那时开始，中国文学的研究复活起来了。

顺便提一下，从战后直到[中国的]“文革”，日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类似文献目录的资料根本没有。战前的部分，有饭田吉郎的近乎完备周详的工作，而关于“文革”后的部分，则有阿部幸夫及其他人编纂的单行本——虽然其中有不少遗漏和不足之处。由于战后的部分没有任何编纂，这下想要查找像今天这样的题目的资料时，竟没有轻易可以用作线索的东西。这时，我心想，年轻人能不能（替我们）来做这个工作呢？

回忆一下当年《中国文学》复刊时的情形。1945年一年中几乎没有杂志发行，即使是一般的刊物，如《世界》的创刊、《中央公论》和《改造》的复刊，我记得也是在1946年的一月份，即战败后的第二年。所以，1946年3月《中国文学》的复刊，可以说是启动得相当早的。那时，引人注目的文章中有佐野学的《毛泽东的文风论》。以前，我曾算是粗略地通览过一遍，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所以这次又重新翻阅了一遍，竟意想不到地冒出了这一个古怪的人来。所谓《毛泽东的文风论》，就是毛泽东有关“三风”整顿^{〔2〕}的话题。毛泽东尽管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同于那种不知融通、变态畸形的“国际主义”的僵硬教条主义，而是密切合乎中国实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此而言，（佐野学）自然说得千真万确，但那时他所说的，也还只是认为，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从事了打倒天皇制的

〔1〕 参见文末所附年表。

〔2〕 毛泽东有《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其中涉及党风、文风、学风。

工作便是不好的这样一种理论的生衍，多多少少感到它是篇含有一种自我辩护意味的文章。就在那时的1946年4月，武田泰淳回到了日本。

武田泰淳去世时，杂志《海》上刊登了堀田善卫和开高健的对话。其中，堀田说：“武田回国是4月，当时有一条规定，不准携带印刷品和手稿。因此，他就把一个相当庞大的物件托付给我了。（中略）好像是他自己写的一些笔记之类的东西。（中略）有关学问的笔记什么的吧。反正有不少东西。再加上武田收集的战后中国文学的书籍、刊物杂志和报纸之类，还有单行本，数量相当多。（中略）他留下的这些东西，加上我自己购集起来的书籍，比如那时在日本还根本不可能输入的冈萨·斯泰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之类的书，还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籍。我的主要是些英文书。（中略）什么也不管了，听天由命吧。我把这些东西全都塞进了铺盖袋，只用一条褥子包严了，带进登陆艇，就这样回国了。这样带回的我的东西和武田的资料，成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基础。”小野忍的《道标》（1979年2月，小泽书店）中有这样的写法：“武田泰淳收集的东西，由堀田善卫运了回来。”也曾几次直接从小野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堀田善卫带回来的书中，令人震惊的有四本，即《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和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读了这些书以后，惊诧于中国文学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文学研究会也不能稀里糊涂了。”

今年9月，我在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上发表与今天的话题差不多的报告时，重新查阅了一遍资料。冈崎提到过这样一句话：“战败后的第二年，归国友人带回来的书中……”这样，我觉得可能就是指武田泰淳带回的书吧。但那时多少还有些疑问，只是没有继续深究下去。这次我又再查阅了一些资料，不仅堀田如此清楚明白地写了，而且小野的东西也还留存着。由此，我才感觉到自己当初的记忆大概是正确的了，但仍留有疑问。

正如年表所示，堀田善卫回国是在1947年1月4日。如果真是

在这个时候，他把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带了回来，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人由此而看到这本书的话，那么在下一个个月，《人间》杂志就刊载了丁玲的这篇小说，这在时间上是不是显得太早了呢？另外还有一个疑问，1946年9月号上刊登的11月号的预告中，作为新近的作品有茅盾的《腐蚀》和《清明前后》、《耶稣之死》等，此外有郭沫若的《苏联纪行》、《屈原》等等，其中，还有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如果这是靠得住的话，没准在堀田回来以前这些书就已经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手了。这一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这些书并不始于武田泰淳带回来的这种说法，从当时的状况和堀田本人的证言中也能得到确认。当时从中国回来的人，什么也不能携带归国，这是一个常识。说到堀田善卫是怎样把这些书带回来的呢，他是差不多半年以后才回国的。战后，他被国民党文化部的有关部门留用，做了不少事。据说是因为他有可以受到国民党政府特别关照的头衔，所以才能把书带回来。但是，也有迹象表明，在堀田把这些书带回来之前，某种程度上日本国内已经有了这些书。至于到底是怎么来的，却还不清楚。今天我只能说这一些。

翻阅那时的杂志便能发现，武田泰淳关于老舍近作的文章啦，别人围绕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啦，还有向鹿地亘提问什么的的东西较多。比如，1946年7、8月的合刊号上，出现了阿部知二、冈崎俊夫等人，那个座谈会名为“关于最近的中国文学”，但几乎都是听武田泰淳介绍在中国的见闻内容。战后最初被日本读书界介绍的中国战时的文学作品，就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吧，《人间》杂志第二卷第二号（1947年2月）发表。

《人间》杂志是由一个叫做镰仓文库的书店发行的。镰仓文库也是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有的书店，简而言之，久米正雄等镰仓文士们，因在战时无所事事，便凑了些书籍，开了个旧书店——这只是根据我的模糊记忆，可能靠不住。于是，战后扩展事业，也就是说，从今以后，日本变成一个文化国了，那就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出版社，这样，镰仓文库便出现了。

例如，在《现代日本文学选》方面，出版了志贺直哉的《和解》等

等。我至今还记得曾经函购过这些书。由这个镰仓文库发行的还有叫《人间》的文学杂志，而《新潮》作为始于战前的文学刊物，仍一直发行着。我想大概在战时，通过合并的缘故，文学刊物就只剩下《新潮》了。稍后，《文学界》复刊了。根据我的模糊记忆——如果错了请原谅——与《新潮》并列，《人间》是作为新的文学杂志创刊的。除了创刊号不同外，以后各期的封面都装饰了安井正太郎的裸妇素描，实在是相当新颖。由于当时纸张缺乏，大多时候仅64页左右，开始的一段时间还稍微厚一些。即便如此，现在来看，仍发表了不少东西，如与《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期刊登的加藤周一的《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连载）那样，把当时的气息活生生地展现出来了。

说到1947年2月，我还是旧制中学的三年级生吧。我的哥哥订了《人间》杂志，我是颇有点不自量力的文学青年，也就哗啦哗啦地看了。我记得曾与哥哥谈起《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话题，只是想不起来当时对这篇小说的内涵抱有怎样的印象，反正以为这是在战后的日本被最早翻译的中国战时的文学作品。至今为止，我也是到处这样写了。但是，这次我又重新调查了一下，原来却是错了。在此之前的1946年10月，周而复的《地下道》就已被翻译了。此后它还被收入了菊地三郎以编译的形式由创艺社出版的《近代文库》（1952年3月）《现代中国短篇集》中。那是很小的袖珍本文集，很快就破了。这套文库我肯定是有的，但这次查阅时竟不知所在。战后创刊的《新日本文学》也在发刊后不久的第5号上刊登了《地下道》，并写着选自中国出版的叫做《文坛》的杂志第2号。这好像才是最早[被翻译]的一篇。

对此，我又进行了调查。出乎意料，最早的一篇是以毛泽东的《现阶段中国新文艺的方向》为题的日译单行本的《文艺讲话》^{〔1〕}。但原先我想可以认为第一个一本正经地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内容当作问题来研究的，也还该算是冈崎写的东西。这次重新查阅资料后才发现，《我在霞村的时候》刊登在《人间》上时，冈崎并没有增加什么解

〔1〕 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说，只是附上了几个词语的“注释”。另外，则只有一篇十五六行的短短的作者介绍，对于内容未落笔墨。以后它又成为单行本，其中加入了《夜》、《新的信念》等一起发行。如今，与此几乎相同的单行本在岩波文库中列入了，我想读过这书的人一定很多吧。在那书的“后记”中，冈崎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字，他是这样写的：

“战时的中国文学状况，直到战争结束，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也几乎是一无所知。重庆的作家在艰难生活中尝受困苦的消息传来，我们就想，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样的吧。大家都在水深火热之中，不是搞文学的地方。但是，揭开盖子一看，全然不同。与日本文学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文学与其说没有因战争而带来空白，不如说从战争中汲取了新的营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略）我最先读到的，就是这本中共地区的，而且是丁玲的小说。战后第二年从上海归国的友人带回来的文学方面的书籍中，就有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短篇集。因为我曾将丁玲的东西翻译出版过，所以她对我来说是个亲切的作家。于是，我便心急火燎地匆匆读了起来。七个短篇，估计都是写山东省一带的，以无数次被日本的侵略进攻所造成的人民大众的深重苦难为材料，描绘了他们的喘息、呻吟、哭泣、呐喊、战斗的姿态与心灵。在作者热切、锐利的眼光中体会到异常的感动。其中，从《我在霞村的时候》、《新的信念》中所受到的感动，是至今为止即使是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未曾感受到的一种战栗的感动。被我们的同胞所伤害的肉体与灵魂的呻吟，像噼里啪里的电流一般使我的心胸震抖。”（1951年10月，四季社）

这种阅读方法，这种认识方法，我想是战败不久后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典型吧。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丸山真男针对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或者叫精神状况，使用了叫做“悔恨的共同体”一词。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词了，没有必要详加说明。但为了那些尚不甚了解的年轻人，在此作一点引用：

“为了把‘被配给的自由’转化成自发的自由，与日本国家一样，我们自身也不得不闯出一个作为知识人的新开端。在这种意志的深